

ZHUANXINGQIZHONGGUOSHOURU  
FENPEIWENTIYANJIU

# 转型期中国收入 分配问题研究

孙晓娜 谢斌◎著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 转型期中国收入分配 问题研究

孙晓娜 谢斌 著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转型期中国收入分配问题研究 / 孙晓娜, 谢斌著.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6

ISBN 978 - 7 - 224 - 11989 - 3

I. ①转… II. ①孙… ②谢… III. ①国民收入分配  
—研究—中国 IV. ①F12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39544 号

## 转型期中国收入分配问题研究

---

---

作 者 孙晓娜 谢斌

出版发行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 147 号 邮编: 710003)

---

印 刷 西安市建明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6 开 17 印张

字 数 284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224 - 11989 - 3

定 价 35.00 元

---

## 摘 要

收入分配问题既是经济理论研究的永恒主题，也是现实社会面临的重大难题，始终是社会关注的热点。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正是各种社会经济问题和矛盾的凸显时期，分配领域的问题尤为突出，城乡、区域、行业之间及其内部的收入分配差距愈益明显，整体呈现出不断扩大的态势，带来了诸如贫困、失业、危机、冲突等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解决分配不公，缩小收入差距，化解社会矛盾势在必行。本书通过对中外收入分配理论的演进过程的梳理和分析，阐释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收入分配制度的历史变迁，从不同收入差距的形成机理出发，全面、客观地分析了转型时期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现状，深刻剖析了不同收入差距对我国经济发展、民主政治推进、核心价值观奠定、和谐社会构建、生态文明建设的影响，借鉴国外收入分配制度的有益经验，结合我国现实国情，提出了调整国民收入格局、合理收入分配机制、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改革思路。

# C o n t e n t s 目 录

第一章 收入分配理论的演进 .....	1
一、西方收入分配理论的演进 .....	1
二、马克思主义收入分配理论的演进 .....	16
三、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创新和收入分配理论的深化 .....	25
第二章 中国收入分配制度的历史变迁 .....	30
一、过渡时期（1949—1956）的收入分配制度 .....	30
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时期（1957—1978）的收入分配制度 .....	36
三、经济社会转型时期（1978—至今）的收入分配制度 .....	44
第三章 转型期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 .....	62
一、我国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与地区间的收入差距 .....	62
二、“二元经济结构”与城乡间居民收入差距 .....	83
三、行业垄断与行业间的收入差距 .....	112
四、分配制度与企业内部的收入差距 .....	121
五、要素差异与居民间的收入差距 .....	125
六、权力寻租与官民间的收入差距 .....	136
第四章 转型期中国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 .....	146
一、合理收入差距与非合理收入差距的界定 .....	146

二、合理收入差距的影响 .....	152
三、不合理收入差距的影响 .....	159
第五章 国外收入分配制度的经验及借鉴 .....	183
一、发达国家收入分配制度 .....	183
二、转轨国家收入分配制度 .....	203
三、发展中国家收入分配制度 .....	211
第六章 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 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	218
一、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现状 .....	218
二、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	225
三、调整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建议 .....	240
参考文献 .....	252
后 记 .....	263

## 第一章 收入分配理论的演进

中国收入分配制度的历史变迁，是在中国基本经济制度的不断调整和经济体制的变革和转轨中行进的，而这一发展、变化的过程，必然以一定理论作为基础和依据，即随着收入分配理论的演进而变化。因而，要把握这种历史变迁的脉络，就必须对国内外收入分配的若干重要理论进行梳理和评析，从中挖掘和寻找影响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演变的理论内核。

### 一、西方收入分配理论的演进

纵观西方经济发展史，收入分配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无不打上时代的烙印，时代特征不同，人们的思想聚焦和认知的差异，便会产生不同观点和看法，形成不同的理论。西方收入分配理论随时代变迁，大致经历了以下的演进过程。

#### （一）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收入分配理论

劳动价值论的初步观点，最早见于被马克思称为“政治经济学之父”的威廉·配第。配第为讨论地租由何而来，引出了劳动价值论，并进一步涉及谁获取这部分劳动剩余的问题。配第在《赋税论》中认为：农产品的生产费用是由工资和种子构成的，从总产品中扣除了生产费用的剩余部分就是地租。地租就是农业工人所生产出来的超过工资和种子的那部分余额，也是全部剩余价值。而工资只是劳动产品的一部分，工人的劳动剩余是社会收入的源泉。<sup>①</sup>由此可以看出，配第的观点十分明确，认为工资、地租、利润等收入都来自于劳动，是劳动创造的。正是基于这种劳动价值论的基础，配第提出了当时所处的资本主义时期的收入分配的基本关系。在配第所处的时代，英国工人的工资是由国家法律规定的。配第主张政府对工资的规定，要考虑劳动者为“生存、劳动和传宗接代”所必需

<sup>①</sup> 配第 《赋税论》，商务印书馆 1972 年版，第 43 页。

的最低限度的生活资料。提出工人的工资等于最低限度生活资料价值是一个规律。这种劳动力价值决定的方式一直延续至今。他还把工资同资本家利润相联系，认为工资和利润之间是一种对立关系。

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亚当·斯密在他的巨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最早且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劳动价值理论，用劳动说明了人类财富的主要来源，承认劳动者在生产中创造财富的作用。斯密的劳动价值论认为商品价值是劳动创造的，劳动的全部产品就是劳动的自然报酬。在社会的“原始状态”里，劳动者的工资等于其全部劳动生产物，但自从资本积累和土地私有发生之后，劳动者必须和资本家、地主分享劳动产品，工资只是劳动产品中的一部分，其他部分要作为利润、地租被资本家和地主占有，利润是对劳动生产物的扣除。在这种情况下，劳动者对原材料增加的价值就分为两部分，其中一部分支付劳动者的工资，另一部分支付雇主的利润。斯密直接从工人剩余劳动中引申出利润，他实际上已经明确地认识到利润正是工人加到劳动材料上价值的扣除部分，即资本家无偿占有工人劳动所创造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劳动者独享全部劳动剩余物的这种原始状态，到了土地私有和资本积累时期，就宣告终结。可见，斯密把利润视为一个历史范畴，它是在私有制和资本积累出现后才产生的，即利润赖以产生的前提条件是直接生产者与劳动条件相分离。斯密还着重从量的角度考察资本主义地租，他指出，作为使用土地代价的地租，是租地人按照土地实际情况所支付的最高价格。在决定租约条件时，租地人设法使其所得的土地生产物份额能够补偿他用以提供种子、支付工资、购置和维持耕畜等农业资本，并得到当地农业资本的普通利润；地主则设法把超过额留给自己，作为地租。斯密这里的地租是全部劳动产品的价值中扣除生产资料的价值、工资和平均利润以后的余额。斯密还认为，随着社会生产分工的发展，对劳动的需求会增加，工资会上涨，上涨的幅度取决于资本积累水平。他认为“使劳动工资提高的，不是庞大的现有国民财富，而是不断增加的国民财富。因此，最高的劳动工资不在最富的国家里，却在最繁荣，即最快变得富裕的国家出现。”<sup>①</sup>在此基础上，斯密在分配的问题上提出了两个观点：第一，他断言利润是资本的“自然报酬”，具有天然合理性。因为是利润构成了资本家维持生活的必需。第二，工资和利润有一个反向变动的关系。虽然斯密是第一个比较系统阐述劳动价值论的古典经济学家，指出工资、利润和

<sup>①</sup> 亚当·斯密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 1983 年版，第 47 页。

地租都来源于工人的劳动，并在此基础上划分了资本主义社会三大阶级，但从一开始，他的劳动价值论就是含糊不清的。一方面，斯密承认劳动价值论，另一方面，又提出商品的价值量由购得的劳动量来决定。这种购买到的、所能支配的劳动量不仅包括工资，还包括利润和地租，因而商品价格是由工资、利润和地租三种收入构成的，于是出现了劳动决定价值到三种收入决定价值的转向。

古典经济学的集大成者李嘉图的分配理论是建立在劳动价值论一元论的基础之上的。他认为：劳动者在生产中所创造的价值是各种所得的唯一源泉，生产物的价值分解为工资、利润、地租等所得的情况下，并不能动摇生产中所消耗的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量这一原理的正确性。工人以工资形式得到的，不过是他在劳动过程中创造价值的一部分，其余的价值被资本家占有，成为资本家的利润，利润是商品价值中扣除工资后的余额。关于地租的性质，李嘉图认为地租是为使用土地原有的不可摧毁的生产力而付给地主的那一部分土地产品。他指出地租是地主阶级没有支付任何代价而获得的报酬。地租使商品价值超过工资加利润的余额，是农产品由最大劳动耗费所决定的社会价值超过个别价值之上的超额利润。可见，他承继了亚当·斯密的劳动创造价值的观点，并将其一以贯之地贯彻于理论始终。此外，李嘉图还从分配的角度，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三大阶级之间的矛盾。他认为在分配方面，最重要的各阶级所得的比例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这种关系是相互对立的关系，工资与利润的变化是成反比例的，工资增加，利润就会减少。地租同利润的变化也是成反比例的，地租的增长，会影响到货币工资的提高，进而会使利润降低。这样，就把工人、资本家和土地占有者这三大阶级摆在了对立的地位，解释了他们在经济利害上的矛盾。

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古典学派的分配理论，是在资本主义产生和上升时期的背景下形成的，当时的新兴资产阶级还是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代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尚未充分表现和暴露出来，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劳动价值理论，能够较为客观地反映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由此形成的分配理论也就能够揭示各阶级之间的对立关系及其利益分配关系。

## （二）建立在要素价值决定论基础上的收入分配理论

如果说李嘉图坚持并发展了斯密的劳动创造价值的理论，那么，以法国庸俗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萨伊为代表的一部分经济学家则沿着斯密价值理论的另一条思路创立了要素价值论，提出了“三位一体”公式及与之相联系的收入分配理论。萨伊认为，生产过程可归结为一般的物质资料的生产过程，这个过程有三个一般

要素：劳动、资本和土地。物质资料生产过程就是通过各种要素协同活动使自然界本身就有的各种物质适宜于用来满足人们需要的过程。生产不是创造物质，而是创造效用；而效用又是商品价值的基础，商品价值的大小取决于其效用。由此，他把劳动、资本、土地这三个要素既看作是创造商品效用即使用价值的要素，又看作是创造商品价值的要素。基于这个理论，萨伊认为：各种要素的所有者都应该依据自己所提供的生产性服务，取得各自收入，以作为对自身耗费的补偿。具体来说，工人应该得到工资，资本家应该得到利息，土地所有者应该得到地租。这个后被马克思称之为“三位一体”的公式，实际上把工人、资本家、土地所有者的收入都看作是各自应该得到的公平合理的报酬。因为，在他看来，工资是劳动服务的报酬，并且认为工人已经得到了他应得的全部报酬，没有受到任何剥削。萨伊还极力主张低工资政策，认为低工资会使商品价值下降，从而对整个社会有利。在资本收入问题上，萨伊把它区分为利息和企业主收入，把利息说成是“对于资本的效用或使用所付的租金”<sup>①</sup>，是资本服务的报酬。而企业主收入则是高级熟练劳动的报酬，是企业家本人的工资。萨伊认为劳动者获得多少工资和资本家获得多少利润是由资本和劳动在创造商品的过程中付出的相对贡献的多少来决定的。萨伊指出“商品的价值并不如一些作者所错误断言的那样，取决于生产性服务（即并不取决于利润和工资的比例）……既然物品是被人们所需要的，那么它的价值应当起源于它的效用。它创造效用的能力……赋予生产性服务价值。价值的大小是同它在商品的生产性协作中的重要性成比例的。”<sup>②</sup>关于地租，萨伊认为它是对土地生产性服务的报酬，是“对借用土地所付的代价”，是地主“实行节约和发挥智慧”的工资。<sup>③</sup>

对萨伊理论进行批判和发展的是约翰·穆勒。穆勒所处的年代经济危机造成了大量工人失业。他一方面不能无视工人的苦难，对雇佣劳动的悲惨处境更是同情；另一方面又囿于资产阶级的传统，因此，在分配问题上采取了折中主义的方法。

关于工资，一方面穆勒认为自然决定于工人阶级的最低生活费用。另一方面，工资还要取决于“流动资本总额”之间的比例。只有工资基金对人口的比率增高了，工资才能上涨；反之，人口对工资基金的比例增高了，工资就会下降。

①③ 萨伊 《政治经济学概论》，商务印书馆 1963 年版，第 394、77 页。

②萨伊 《政治经济学概论》，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第 114 页。

因此，工人阶级为提高工资的斗争是徒劳的。穆勒把利润分解为“利息、保险费和管理工资”。认为利息是“节欲”的报酬，保险费是“投资风险的报偿”，管理工资是资本家在领导生产时“所付出的劳动技能的代价”。在穆勒以后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者，大都把利息和利润分为两个范畴，以“节欲”解释利息，以保险费和管理工资解释利润。

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和功利主义者，他一方面坚持传统自由主义的原则，同时又努力使传统自由主义原则与新的现实、新的思想结合起来，对传统的自由主义加以修正。例如，他坚持认为社会利益不能与个人利益发生矛盾，穆勒指出，“凡是能促进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行动就是正义的行动”。穆勒在坚持个人主义这一自由主义最高准则的同时，又注意到公共的利益。在社会经济方面，穆勒也提出了自己的主张，早年他主张通过提高生活水平，来改善工人的地位，主要办法是限制家庭人口。后来，他逐渐对英国的社会制度产生不满，认为这种制度使广大民众以工资为生，而少数人则靠租金、利润和利息过活，他希望通过合理组织来消灭这种制度的弊端，建立一种新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人们都“为他的国家种地和织布”，多余的产品分给劳动者。到了晚年，穆勒的主张越来越倾向于社会主义。<sup>①</sup>

在以后的经济理论中，我们到处可以看到穆勒在分配问题上的两个基本观点：其一，工资决定于工人阶级的最低生活费用；其二，生产活动中的其他要素由其功能决定，具有天然合理性。

### （三）以边际理论为基础的收入分配理论

如果说古典经济学家们只是从理论上论证了价值的创造和与此相适应的价值分配问题，那么，“边际革命”之后，所谓的新古典经济学则对财富价值的分配通过技术性的手段和方法注入了量化的衡量标准，这就是“边际”的方法。他们通过边际价值理论不仅论证了财富价值的分配依据，而且论证了分配的比例，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萨伊、穆勒等人的效用价值论或要素价值论和由此决定的收入分配理论。

边际学派提出边际效用决定价值，认为商品的价值决定于商品的边际效用。“边际革命”的发起人之一，奥地利学派的创始人卡尔·门格尔认为，生产资料

<sup>①</sup> 丁建定《从济贫到社会保险——英国现代保障制度的建立（1870—191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3页。

的价值决定于最终制成品的边际效用，其价值是以最终制成品的效用逐级传递到一切作为生产手段的物品组合上，每一级生产资料的价值都由其下一级生产性产品的价值来衡量，直到最终制成的消费品。

而奥地利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的欧根·冯·庞巴维克根据人们心理上的感觉，区别了需要的种类和具体需要的程度。庞巴维克认为“所谓需要的分级，可以指需要的分级，可以指需要种类的分级，也可以指需要的程度的分级。”<sup>①</sup>根据这一思想，他设计了图表来表示这种分类。并由此推出边际效用价值论：“一件物品的价值，是由现有的同样的一些物品所能满足的一切需要中，最不迫切的那一具体需要的重要性来衡量。……决定价值量的规律，可以用下面公式来表达：一件物品的价值是由它的边际效用决定的。”<sup>②</sup>

后来，边际学派将这一原理来说明生产性物品即生产资料价值的决定，同时用它来揭示分配问题。奥地利学派的另一代表人物维塞尔认为，生产资料包括一切生产要素——土地、劳动和资本。而生产资料的价值问题实际上就是生产要素的价值问题，生产要素的价值问题就是社会所得的分配问题。维塞尔建立的“归算理论”，就是解决如何把产品的价值分成份额，并把这些份额归属于每一个有关的生产要素。维塞尔指出“每一种生产资料、每一种工具、每一块土地或者一份原料、每一种劳务，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都代表事业中的一份。这样一份，由于对于这种事业的结果有所贡献，因而便使结果的一个份额归算于它，并且它的价值也就必须由这种结果的总数来决定的。”<sup>③</sup>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经济学家克拉克以其边际生产力理论为基础，对萨伊的效用价值论以及要素分配论作了创新性的说明。克拉克认为商品的价值是由各种生产要素共同创造的。每个生产要素在参加生产过程中都有其独特的贡献，也都有相应的报酬，这就是分配的自然规律。克拉克以生产要素共同创造价值为前提，先以土地收益递减规律引出生产力递减规律，接着把生产力递减规律应用到劳动和资本两个要素上去，得出劳动生产力递减规律和资本生产力递减规律。最后通过劳动生产力和资本生产力两个递减规律，引出劳动和资本的边际生产力。克拉克认为：工资是由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决定的。在静态条件下假定资本数量不变，不断增加工人人数，这样每个单位工人平均得到的工具设备逐渐减

①② 庞巴维克 《资本实证论》，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156、167页。

③ 季陶达 《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选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462页。

少，技术供应状况逐渐变化，则每一个追加的单位工人的劳动生产力必然递减，最后增加的那一个单位的劳动的生产率最低，这就是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它不仅决定边际工人的工资，而且决定所有与他处于同样劳动条件下的工人的工资。资本的边际生产力就是假定工人的人数不变，不断增加资本，则单位资本所使用的工人数量不断减少，新增加的逐个资本所提供的产品数量也会递减，这就是资本生产力递减规律。最后增加的单位资本叫边际资本，它所增加的产量最小，生产力最低，叫作资本的边际生产力。资本的边际生产力即边际资本的增产量决定利息率的标准。它不仅决定边际资本的利息，也决定全部资本的利息标准。由此，克拉克得出在所谓静态经济条件下，三个要素在生产中的贡献正好等于它们各自的边际产量，它们在分配中的收入正好等于它们各自边际产量的结论。在论证过程中，克拉克还把资本家与企业家分离开来，前者为资本所有者，后者为企业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资本所有者得到利息，企业家得到工资，企业家的工资与劳动者的工资一样，都取决于他们各自的边际生产力。

#### （四）建立于均衡价格理论基础上的收入分配理论

马歇尔是边际效用学派的创始人之一，或许我们本应该把他的分配理论归结到边际效用价值论当中。但是，由于他对价值决定的分析维度与之前的经济学家们有所不同，故而在此我们将其均衡价格理论独立出来，用以专门分析对其分配理论的影响。因为，无论是劳动价值论还是效用价值论（生产费用理论），都是从生产的角度对价值进行的定义和衡量，边际效用价值论开始从需求角度对价值进行定义和衡量。而马歇尔则综合了原有的只侧重生产（供给）方面或者只侧重消费（需求）方面的价值理论，创建了均衡价格理论。在此基础上又建立了他的收入分配理论。国民收入分配论是其整个经济理论体系的中心。

马歇尔认为，所谓收入分配就是把国民收入在各种生产要素之间进行分割。国民收入是各生产要素所带来的纯产量（纯收入），也就是从总收入中减去各种费用之后的余额。同时国民收入也是对各生产要素进行支付的唯一源泉。他把生产要素分为劳动、资本、土地和企业组织四种，认为他们的均衡价格就是各自的收入，即工资、利息、地租和利润。生产要素的均衡价格由它们的供求关系决定，生产要素的需求价格和供给价格相均衡的价格，就是它们的均衡价格或报酬。

关于工资，马歇尔认为，工资是劳动的报酬，是劳动的需求价格和供给价格均衡时的价格。劳动的需求价格是资本家购买劳动时愿付的价格。劳动的供给价

格是工人所接受的价格。劳动的需求价格由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决定。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就是边际工人增加的产量，即劳动的边际产量。劳动的供给价格由劳动的生活维持费用和培训教育费用决定。劳动的维持费即劳动者的生活费用，亦即劳动者生存、生活的必需品、劳动训练、抚养家庭的费用。

马歇尔认为纯利息是资本这个生产要素的价格，它是由资本的需求价格和供给价格相均衡所决定的。资本的需求价格由资本的边际生产力决定。资本的边际生产力是边际投资所增加的产量，即资本的边际产量。它是企业家介入资本时所愿意支付的价格。资本的供给价格，决定于资本家的“等待”和“牺牲”，也就是借贷资本家同意放款的价格。利息就是对这种“等待”和“牺牲”的报酬。

对于利润的认识，马歇尔所给的解释是：利润是“组织”即“企业经营和管理能力”的均衡价格。他认为，企业家担负组织和领导企业的全部责任，因而是“高度熟练的产业阶级”。“企业经营和管理”的需求价格是全社会对企业家组织、经营、管理企业必须付出的价格和代价。这种价格取决于“企业经营和管理能力”的边际生产力，即企业家最合理地配置各种生产要素进行生产所能获得的全部纯收入。企业组织经营能力的供给价格取决于企业家生活和专门教育、训练的费用。马歇尔认为利润的形成更多地取决于企业组织经营者能力的大小。

就地租而言，马歇尔认为它是土地的收益。在他看来，土地的供给是固定不变的，没有生产费用，也没有供给价格。因此，地租只受土地需求的影响，土地的需求价格取决于土地的边际生产力。他从“农业上报酬递减趋势”出发，认为耕种者对同一土地连续追加资本和劳动，农产品总产量的增加率是递减的。最后投入土地的劳动和资本叫作土地的边际耕作。它提供的产量仅是偿付边际劳动和边际资本的报酬，不能给地主带来收入。总产量超过这个边际产量的余额就是他的“生产者剩余”，也就是地租。

概括起来，马歇尔的分配理论包括两个基本内容：第一，市场经济中的收入分配决定于各生产要素在联合生产中基于生产的技术条件而对产出的实际贡献，因而，收入分配是一个与制度结构或制度安排无关的价格决定过程。第二，各要素在分配过程中取得的收入总和恒等于各要素在生产中对总产出的实际贡献的总和。<sup>①</sup>

从马歇尔的收入分配理论可以看出，同萨伊一样，把分配与生产要素的投入

<sup>①</sup> 马歇尔 《经济学原理》（下卷），商务印书馆 1965 年版，第 208 页。

联系起来考虑，坚持了萨伊的要素分配理论。不仅如此，马歇尔还将萨伊的三要素论发展成为四要素论。在劳动、资本、土地三要素的基础上，加上了“企业家能力”这第四个要素。劳动、资本、土地、企业家的经营能力分别得到与它们各自创造的边际产量相当的份额。可以说，马歇尔的分配理论是萨伊生产要素分配理论的演进和发展，只不过运用了边际分析的方法，即将边际效用的价值决定论运用其中，从供给和需求的角度进行的综合分析。

进入20世纪之后，在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过程中，阶级矛盾、社会矛盾日益尖锐，而被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奉为神灵般的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的调节作用渐显失灵，各种矛盾问题的聚合，终于酿成了1929—1933年的巨大经济危机，吞噬了资本主义社会二三十年的发展成果，使其经济发展倒退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水平，为此，以凯恩斯为代表的当代西方经济学家们，开始反思、总结经济运行中的问题，提出了国家干预经济的主张。收入分配理论的研究也由微观层面转向宏观层面，转向了对社会福利、国家制度、经济发展等方面的关注，论证了收入分配的公平性、合理性等问题，由此形成了当代西方不同时期的收入分配理论。

#### （五）以增进社会福利为核心的收入分配理论

20世纪初，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霍布森，明确提出经济学应以社会福利作为其研究中心。他认为，为了保证“最大社会福利”，国家必须干预经济生活，实行“国家社会主义”。而这种干预不仅包括分配领域，还应包括生产领域；国家不仅可以通过赋税消除贫富不均，实行免费医疗，老年抚恤金和比较充分的失业救济等“合理的、健全的社会政策”，而且还应对一些企业实行直接管制，以便把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调和起来，使“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得以实现。

意大利的经济学家，洛桑学派的创建人维尔弗雷多·帕累托，通过定量计算的技术概念，把个人收入分配等问题变迁为福利问题，又使福利问题转变成了社会总量增进的效率问题。由此得出，生产和交换的最优条件，就是使社会福利达到最大限度的条件。按照帕累托的说法，如果社会资源的配置已经达到这样一种状态，即任何重新调整都不可能在不使其他任何人境况变坏的情况下，而使任何一人的境况更好，那么，这种资源配置的状况就是最佳的，也就是具有效率的。这就是著名的“帕累托效率”。如果达不到这种状态，则可以通过资源配置的重新调整，实现帕累托改进，达到帕累托最优。正是以帕累托最优为起点，西方国家出现了专门为解决实际生活中分配不平等的福利经济学，并在此基础上诞生了

福利国家。

福利经济学的创始人英国经济学家阿瑟·塞西尔·庇古，在1920年出版的《福利经济学》一书中，对“社会经济福利”这个课题建立起一套完整的、系统的理论和政策体系，使福利经济学成为一门分支学科，并在其后的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中产生重大的影响。庇古认为，衡量社会经济福利的尺度是“国民收入”，它包括国民收入的数量及其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状况。具体而言，第一，一国的经济福利可以用国民收入的多少来表示，即一国的国民收入量越大，则经济福利也越大，经济福利的增加表现为国民收入量的增加。第二，一国的经济福利是国民中每个人的经济福利的总和。而每个人的经济福利由他所得到的物品的效用构成。在他看来，社会经济福利的增减同收入分配合理与否紧密地相联系。如果分配与再分配的结果增进了社会经济福利，这种分配就是合理的，反之就是不合理的。根据边际效用的递减规律，随着货币收入的增加，货币对持有者的边际效用是递减的。穷人的货币收入少，货币收入相对于他来讲边际效用就很大；富人的货币收入很多，货币收入对他的边际效用较小。因此，一国政府可以采取国民收入的再分配政策，如通过实行累进税的办法将富人的货币收入向穷人转移，使社会总的经济效用增加，收入分配趋于合理，社会福利也就会增加。可见，庇古的福利经济学中对收入分配理论的探讨已经向政策化、制度化转变，这是区别于以往的收入分配理论的显著特点。

如果说以庇古为代表的旧福利经济学将其分配理论建立在基数效用论的基础上，即将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用于分析个人收入分配，讨论了收入分配的福利含义。新福利经济学的主要代表如卡尔多、希克斯、萨缪尔森等人则主张序数效用论，而反对基数效用论。他们认为，只有资源配置效率才是最大的福利，他们公平理论的基础是“帕累托最优”。他们将“帕累托最优”视为绝对公平标准，在实践中遇到矛盾是必然的。如果要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就需要对利益关系进行重新调整与改革。在此过程中，一些人可能福利增加，而另一些人可能福利减少，根据“帕累托最优”原理，这种调整与改革就无法进行。为解决这一矛盾，他们认为如果一部分社会成员经济状况得到改善，而另一部分社会成员的经济状况恶化，但只要从整个社会来看，社会获利总额超过受损总额，就是可行的，政府可以向获利者征收特定税以补偿受损者。此外，萨缪尔森认为，要素的边际生产率决定要素的价格，即要素的价格与其边际产品相等，要素分配的边际生产率理论虽然很简单，但它说明了完全竞争条件下收入分配的全部情况。市场经济的收入

以工资、利润、租金和利息等形式分配给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另外，各级政府以转移支付的形式向社会提供收入，社会保险是转移支付的最大一项，此外，还包括津贴、补贴和福利支出。所以，个人收入等于市场要素收入加转移支付。收入再分配是政府的一个重要经济职能。在关于社会福利增进的问题上，他们认为，如果用收入来表示社会福利，那么，社会福利就是可以度量和比较的。在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动中，总是有受益者和受损者，如果受益者能够给予受损者以补偿，并且这一补偿又能够为受损者所接受，那就意味着社会福利增进了。

20世纪30年代，伴随着经济危机的发生，以英国经济学家梅纳德·凯恩斯为代表的宏观经济理论孕育而生。1936年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出版，在书中他对资本主义的收入分配提出了不同于传统经济学的看法。它打破了传统的以市场为基础的分配理论，认为完全依靠市场来进行收入分配是不行的。凯恩斯认为在现存的经济社会中，由于劳动力市场不能提供充分就业，加之财富与收入分配不公，抑制了人们的有效需求，制约了财富的增长。在《通论》问世之前，西方经济学界认为，资本增加取决于个人储蓄动机，大部分资本的增加取决于富人过剩的收入中储蓄而来。而凯恩斯在《通论》中却指出：在没有达到充分就业之前，较低的消费倾向并不能带来资本的增长。人们的收入水平低，制约了现时消费，使消费需求降低。由于不是人们的节约导致的需求减少，故而不能真正带来储蓄的增加或资本投入的增加，不仅如此，还会遏制资本的增长。只有在达到充分就业的情况下，较低的消费倾向，才会有利于资本的增长。因为，当人们收入水平随着就业情况的改善而提高后，消费倾向的降低，才意味着储蓄或投资的增加。可见，凯恩斯认为，收入分配的变化将影响消费倾向，收入分配的均等会提高消费倾向。在达到充分就业之先，消费倾向的提高将减少资本积累的阻碍，这就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收入分配的极不平等，对资本主义的自身发展是有阻碍的。在这里收入分配与消费倾向密切相关。

关于收入分配与有效需求的关系，凯恩斯认为，收入分配不均的倾向造成了消费支出的不足。这是因为，如果国民收入中的较大部分分配给那些需求已经得到满足的高收入家庭，他们只会把收入的一部分用于消费，而把大部分储蓄起来，结果造成了对商品的消费需求不足。凯恩斯认为，较大的收入分配的均等机会提高消费倾向，而消费倾向的增加，将有助于投资引诱。那么，如何提高消费倾向呢？凯恩斯主张以国家干预经济的方式，配合一些政策措施，以增加全社会所有要素的收入，来刺激和促进消费。比如以政府直接举办公共工程解决充分就